

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北京法国传教团*

吕 颖

〔摘要〕18 世纪的耶稣会曾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但因其直接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以及其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广遭诟病，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在欧洲多国的压力下，被迫于 1773 年通过敕书“吾主救世主”宣布取缔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耶稣会。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在华就存在利益纷争的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开始觊觎和染指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法国在京前耶稣会士和法国国王及大臣们突破各种阻力，共同展开了一场持续了整十年、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廷传信部最终于 1783 年同意将北京法国传教团交由遣使会接管。1814 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耶稣会，1842 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但北京地区仍由遣使会负责。

〔关键词〕耶稣会 遣使会 传教士 法国传教团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16) -02-0000-00

耶稣会自 1534 年由依纳爵·罗耀拉 (Ignace de Loyola) 在巴黎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外方传教。方济各·沙勿略 (Francisco Xavier) 是首位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从他抵达广东上川岛的 1552 年到 1800 年间，共有 470 余位^①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目前学界对耶稣会士的研究非常全面且深入，涉及到传教活动及策略、中国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等各领域。但对于 1773 年耶稣会被取缔后，在华前耶稣会士的研究却鲜有人涉及。

耶稣会被取缔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在华法国耶稣会士共有十四位，除了四位^②在外省传教外，其余十位都聚集在北京。面对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对北京法国传教团财产的觊觎，在京法国传教士和法国大臣们不断通信，共同商议保卫和拯救传教团事宜。本文主要以这些通信为依据，探讨耶稣会被取缔后北京法国传教团所面临的困境，揭示传教士、法国国王和大臣们为挽救它所做出的努力，并简要分析法国这次远程大救援的动因。

一、耶稣会被取缔的原因

耶稣会自创建以来，发展极为迅猛，快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在许多领域产生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吕颖 (1978 -)，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fidelite@sina.com
① 参见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7—57 页。
② 这四位神父分别是：石若翰 (Jean-Baptiste de la Roche)、河弥德 (Mathieu la Mathe)、巴良 (Léon Baron) 和腊伯都 (Pierre Ladmira)。

重大影响的同时，它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种种指责和诘难。

首先，耶稣会因直接服从于罗马教廷的领导而造成了其与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各国政府不能容忍天主教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是希望将其置于国家政权之下。法国法院对耶稣会的评价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一种普遍看法：“上述修会（指耶稣会）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它违反自然法，有损于一切宗教和世俗权威。它企图在宗教机构的特殊面纱下，向教会和各国引入的不是一个真正希望传播福音的修会，而是一支政治大军。这支政治大军的宗旨在于以持续的活动，通过各种间接的、隐蔽的或拐弯抹角的途径，来达到绝对的独立，继而篡夺一切权力。”^①

其次，耶稣会的海外传教活动也常常受到批判和攻击。天主教的一些其它修会认为耶稣会在传教过程中所采用的适应政策，使基督教变得印度化、中国化，并逐渐把基督教引向歧途。海外的殖民者认为耶稣会对印第安人的保护，增强了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反殖民力量，阻碍了他们的殖民活动。而海外商人更视耶稣会士为贸易上的竞争对手，因为在有些地区，传教士们为了弥补传教经费的不足，往往参与一些世俗的商贸行为。

另外，耶稣会的反对者总是对耶稣会士通过亲近国王来接近权力的做法感到极度猜疑和嫉妒。他们声称君主与耶稣会忏悔神父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极有可能伤害到君主制度本身，并以勒泰利耶神父（Michel Le Tellier）为例，认为他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的最后岁月对国王施加了邪恶的影响，象征着耶稣会士所作所为中最令人憎恨的一面。^②

与此同时，耶稣会的教育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启蒙运动者的强烈不满。一方面，他们反对耶稣会学校所始终坚持的面向各阶层开放的免费教育，认为大学应当只面对那些上得起学的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毕业生过量，避免劳动阶层的孩子离开自己的阶层。另一方面，他们还批判耶稣会的教学方法缺乏对学生个人理解力的启发，教学内容过分重视拉丁语教学，忽视母语教学，而且对新兴起的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③

耶稣会的反对者们一直通过各种努力企图削弱甚至铲除耶稣会在宗教和政治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1759年，葡萄牙的强权宰相蓬巴尔（Pombal）就开始驱逐耶稣会士。他指责耶稣会士曾在巴拉圭的瓜拉尼战争中，伙同当地的印第安人共同对付葡萄牙人，并认定耶稣会士曾参与过暗杀国王若泽一世（Joseph I）的行动。1762年，巴黎议会以多数票通过做出判决，耶稣会违反了天赋人权，是国家法律的敌人。议会下令解散耶稣会并没收其财产。虽然路易十五（Louis XV）本人对耶稣会并无敌意，但在议会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于1764年12月1日，宣布禁止耶稣会在法国的活动。随后，1767年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1758年在帕尔马和马耳他岛，耶稣会士都遭到了被驱逐的命运，有的被遣返回了欧洲，而有的便命丧途中。当波旁王朝的各个宫廷联合起来，给教皇克莱芒十三世（Clément XIII）施压逼迫其解散耶稣会时，却遭到了其坚定的拒绝。但年迈的教皇因中风突然离世，性格软弱、优柔寡断的新教皇克莱芒十四世（Clément XIV）在欧洲君主们的逼迫下最终做出了妥协。1773年7月21日，他通过敕书“吾主救世主”（Dominus ac Redemptor）宣布取缔耶稣会。^④教皇的无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教皇不是通过诏书（Bulle），而是通过级别较低的敕书（Bref）来解散罗耀拉所创建的耶稣会的。敕书中并没有批判耶稣会的道德、纪律以及教义，只是讲述了欧洲宫廷对耶稣会的指控，”^⑤并认为“如果这个

① 埃德蒙·帕里斯著，张茹萍译：《耶稣会士秘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82页。
 ② 孟德卫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67页。
 ③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著，谷裕译：《耶稣会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80—81页。
 ④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著，谷裕译：《耶稣会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⑤ Catherine Marin.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près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Transversalités, no 107, juillet-août 2008, p. 12.

修会存在，教会内部绝对没有长久与真实的和平”^①。

二、法国传教团在华的建立和发展

在华法国传教团的建立要追溯到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的首个耶稣会传教团。1685 年，法国出于政治、宗教和科学的目的，派遣了六位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他们是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李明（Louis Le Comte）、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和塔查尔（Guy Tachard）。这是一批彻底代表法国国王的耶稣会士，他们既未事先获得耶稣会总会长的批准和教廷许可，又绕过了葡萄牙保教权的控制，并坚决不对传信部的宗座代牧宣誓。可见，传教士们作为国家公民和修会会士的两种身份在民族国家日益强大的背景下，逐渐向国家利益靠拢。^②

除塔查尔外，其余五位耶稣会士于 1687 年抵达中国。他们为康熙皇帝提供了各种政治和生活上的服务，作为回报，康熙 1692 年发布了“容教令”，允许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1693 年又在北京内城赐予他们一所宅院，以使其与葡萄牙教士分开居住。1699 年，康熙又批准耶稣会士兴建天主教堂，为此还拨给银两、材料若干，命工部帮助建造。在白晋和张诚神父的关注下，加之路易十四的慷慨资助，四年后一座壮观宏伟的法国教堂拔地而起，这就是著名的北堂。

到 1687 年耶稣会被取缔，北京法国传教团团长依次是：洪若翰（1687 年），张诚（1699 年），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1706 年），赫苍璧（Julien Placide Hervieu）（1719 年），胥孟德（Joseph Labbe）（1736 年），赫苍璧（1740 年），沙如玉（Valentin Chaliér）（1745 年），纽若翰（Jean Sylvain de Neuville）（1747 年），嘉类思（Louis-Marie Du Gad）（1752 年），纽若翰（1757 年），费若瑟（Joseph-Louis Le Febvre）（1762 年），石若翰（Jean-Baptiste de la Roche）（1769 年）以及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1770 年）^③。

其实自法国传教团入华之日起，法国传教士与教廷传信部及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的矛盾便突显起来。首先是宣誓问题，中国副省会长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视察员马丁（P. Simao Martins）及其继任者方济各（Francesco Saverio Filippucci）都要求法国传教士按传信部要求宣誓，而且态度强硬。最终南京宗座代牧罗文藻神父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赋予了法国人职权而没有要求他们宣誓。但法葡之间的纷争并未就此停歇，而是愈演愈烈。洪若翰以及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Lachaise）不断致信耶稣会总会长蒂斯·贡萨雷斯（Thyrse Gonzalez），希望其能够同意法国人开辟自己的传教区。最终 1699 年当洪若翰返回欧洲时，总会长任命他为具有行使副省会长权力的法国人传教区会长，这标志着独立于副省的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区正式成立。1700 年 11 月 30 日，张诚（当时的北京传教团团长）正式出任在华法国传教区第一任会长，负责管理所有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

三、保卫北京法国传教团的努力

1774 年 8 月 15 日，当取缔耶稣会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北京还有十位法国耶稣会士，他们是：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蒋友仁（Michel Benoist）、晁俊秀、韩国英（Pierre-Martial

①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第 218 页。

②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35 页。

③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3), pp. 273 - 274.

Cibot)、金济时 (Jean-Paul-Louis Collas)、甘若翰 (Jean Joseph de Grammont)、贺清泰 (Louis Antoine de Poirot)、潘延璋 (Giuseppe Panzi)、方守义 (J. - F. - Marie-Dieudonné d'Ollières) 和汪达洪 (Jean-Mathieu de Ventavon)。^①

1774 年 10 月 22 日，备受打击的蒋友仁因中风而去世。钱德明由此成为了法国传教团中资历最老的神父，所有的信件遂由他负责回复。1774 年 10 月 1 日，虽然还未正式收到教皇的敕书，但已经获此消息的钱德明便给法国代理外长贝尔坦 (Henri Léonard Jean Baptiste Bertin) 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首先强调了法国对北京法国传教团财产的所有权，并对其它修会的觊觎表示担忧和愤慨，他讲道：

想到我们在此的所有设施——也许是法国在遥远的国度建立的最美的——要转入他人之手，就让人十分气愤。我认为，我们的教堂、图书馆、天文台、各种仪器和我们的住院，无不体现着法国的印记，如果它们要变成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教徒的猎物，那实在是太过分了。路易大帝和路易十五国王一直保护着我们，并赐予无数恩惠。法国的最高部长们包括您都赋予我们荣耀，施予保护。我们在此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们的国家。在此我不是对变得什么都不是的我们而言，而是对我们的国家说，属于自己名正言顺的东西被掠夺，难道不是一种侮辱吗？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尽全力阻止别人夺取本属于我们的东西。

接着，钱德明强调了在京教士与外省教士的不同。在外省，虔诚、热情、工作、善意就足够了；而在北京，还需要科学与才智，需要获得皇帝的恩宠，需要让自己对宫廷有所贡献。钱德明认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身上具备这些素质，建议派遣他们来接管北京法国传教团。从法国后来采取的举措可以看出，钱德明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贝尔坦的采纳，虽然由于外方传教会的拒绝，该想法最终并未实现。

此外，钱德明在该信中提出的在鞑靼地区建立教区的建议也让路易十六和贝尔坦颇为赞赏，并进行过尝试。钱德明当时这样写道：

葡萄牙国王对广袤中国的三个教区进行了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给教区教士们发放微薄的年金。那么为什么法国国王不能通过发放年金，而对我们在广大的鞑靼地区建立的教区任命呢？例如，在盛京，有相当多的基督徒，而在辽东（盛京为其省会）就更多了。那么一个大教区已经形成了。我们可以将长城以外的地区都划入这个教区，并加入内城，或仅仅是皇宫城墙围起来的部分。而被任命为盛京主教的人将和法国人一起在这里安静生活，与葡萄牙主教井水不犯河水。通过这种简单的任命建立一个新教区，法国国王就可以相同或相似的代价，在中国鞑靼地区获得同葡萄牙国王在中国汉人地区拥有的相同的权力。^②

1775 年 11 月，教皇下令解散耶稣会的敕书到达了北京。钱德明在 1776 年 9 月给贝尔坦的另一封信中，讲述了耶稣会士们签署敕令的情景。

去年，一个名叫约瑟夫·圣·特雷斯 (Joseph Sainte Thérèse) 的德国加尔默罗会修士受南京主教之命，来到我们住院宣布教皇取缔耶稣会的敕令。他成为传信部教士已经三十余年，现居住在北京。我们恭敬但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教皇的敕令，一个接一个地签了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耶稣会传教士，因为它被取缔了，我们将成为在俗教士，依附于教区主教。

钱德明接着提及了南京主教和澳门主教在北京法国传教团财产去向方面出现的分歧，以及教士们维护法国利益的立场：

① Catherine Marin.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près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Transversalités*, no 107, juillet - août 2008, pp. 18 - 19.

②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3), pp. 287 - 297.

南京主教代理，这个加尔默罗会修士还建议我们签写：教堂、住院以及法国耶稣会士使用的一切都要转交给教皇。我们回答说，作为法国传教团世俗事务的管理者，没有法国国王和中国皇帝的允许，我们无权交出财产，因为我们在这里拥有的一切都是这两位君主对法国人的馈赠，而非对耶稣会士……

澳门主教声称自己是北京教区唯一的管理人，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北京教区只是澳门教区的一个分支。当没有合适的神父管理时，澳门主教就恢复他对原先所辖教区的所有权力。2、南京主教不能是北京教区的管理人，因为他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事务没有管理权。这才符合他在圣职受任礼时的誓言，即不做任何违背葡萄牙国王权力的事情。3、即使他作为距离最近的主教而要管理北京教区时，那也必须获得果阿大主教的同意，但是他没有（这里指新任主教，因为他获得了上任主教的同意）。^①

钱德明提及的约瑟夫是当时北京教区的代理主教。耶稣会被取缔时，南京主教也是一名耶稣会士，名为南怀仁（Godefrid Xavier de Laimbeckhoven），他1752年接受任命，1756年7月22日在澳门举行了授职礼。北京主教索智能（Polycarpe de Souza）于1757年5月26日去世。南京主教作为距离最近的主教，将北京教区纳入其辖下，并派约瑟夫负责管理。1773年前后，传信部下达指令，任命约瑟夫为北京代理主教。澳门主教和南京主教本来相安无事，但耶稣会被取缔后，两位主教矛盾立现，他们都声称自己是北京教区的管理者，以便合法地继承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

这场看似两位主教之间的纷争，事实上是葡萄牙和罗马之间利益争夺的结果。这种局面的产生和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内圣统制和代牧制并存的情况有关。1576年，澳门教区成立，由于葡萄牙在东方拥有的保教权，澳门教区隶属于印度果阿大主教区，澳门主教由葡萄牙国王任命。162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Grégoire XV）设立传信部，决心统筹各传教区的传教事宜。1660年，传信部在中国推行宗座代牧制，从澳门教区分设南京宗座代牧区，变相将代牧的任命权从葡萄牙手中收回。1680年，福建宗座代牧区以及1687年江西、广东两代牧区的相继成立，令葡萄牙国王大为不悦。1690年，为安抚葡萄牙，罗马教廷决定设立南京和北京两个主教区。这两个教区从理论上依附于果阿大主教区以及受葡萄牙保护，但实际上它们仍隶属于罗马教廷传信部，由传信部直接授权，并与其直接联系。所以，澳门主教代表的是葡萄牙的利益，南京主教代表的是罗马传信部的利益。

面对葡萄牙和罗马的垂涎，路易十六立刻采取措施，希望能够保住北京法国传教团。正如贝尔坦给韩国英的信中写道：

国王绝不容忍别人毁掉他创立的事业并将一切事务交于罗马来解决。这个信仰基督教的国王不会放过他们，他也不会放弃那些从事宗教事业，但同样尽心尽力为他服务的人。^②

路易十六首先为在华前耶稣会士们提供了经济援助。1775年10月，国王的第一笔经费15000里弗尔到达中国，接着他又给传教团管理财务的教士拨付了1200里弗尔。1776年，为了保障科学工作的继续，新的一笔援助15000里弗尔到达中国。^③同时，路易十六还命法国海军部长萨尔提尼（Antoine de Sartine）着手负责北京法国传教团事务，并通过他与身在巴黎的嘉类思神父取得联系，让嘉神父建立一所学校，专门培养一批传教士来接替前耶稣会士们在华的工作。

①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3), pp. 305 – 307.

②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3), p. 308.

③ Catherine Marin.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près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Transversalités*, no 107, juillet-août 2008, p. 20.

贝尔坦在 1776 年 11 月 29 日写给晁俊秀的信中透露了法国所采取的这些措施：

和传教团有关的事宜，你们应该同海军部长直接沟通。你们通过这次季风也将会收到萨尔提尼部长的指令，允许你们代表国王继续管理和传教团有关的所有世俗事务，并和教廷共同处理相关的宗教事务。萨尔提尼部长还代表国王任命大家都熟知的嘉类思神父负责为传教团选派教士，做一些以前巴黎发愿者之家所做的工作以满足传教团在法国的其他需求。^①

嘉类思神父曾于 1738 年来华，1752 至 1758 年间任在华法国传教区会长。1762 年，他在澳门被葡萄牙人逮捕，后被遣送并囚禁于里斯本^②。1766 年，嘉类思返回巴黎后成为圣雅克街加尔默罗会会长。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无论是法国国王还是大臣们都倾向于建立一所学校培养新的传教士，而不是让某一个宗教团体直接去接管法国传教团，以避免该传教团成为葡萄牙的附属或保护对象。“嘉神父欣然接受了新的任务，但事情很快令他失望不已。反对者们总是很谨慎，千方百计地想要破坏这个计划；他们害怕一个新形式的耶稣会初修院成立。因此嘉神父仅仅是被任命为北京法国传教团财务管理人，并负责挑选三四个候选人”。^③

到 1776 年，法国传教士们凭借着法国国王和中国皇帝的庇护以及他们的努力，暂时保住了北京法国传教团财产，使之免遭被葡萄牙或罗马传信部并吞的命运。他们还怀有一丝希望，希望教皇能够收回成命，希望耶稣会能够重建。

四、重建耶稣会传教团的尝试

1775 年，俄罗斯耶稣会副省会长向教皇请求承认他们教会的存在并同意其扩充教会成员，而教皇并没有拒绝，这件事似乎让路易十六产生了重建耶稣会传教团的想法。但他明白这在法国并非易事，因为 1774 年 12 月巴黎议会开始对他庇护耶稣会士的行为进行监督。1777 年，巴黎议会重新逮捕耶稣会的“残余”，这让北京的传教士们重建耶稣会传教团的希望破灭了。晁俊秀的信中透露出了他的失望情绪，“1777 年，对我们修会仅存的可怜神父们的逮捕让我们本怀有的希望彻底远离。从今以后，我只想着灵魂得救，为此我已漂洋过海。其他一切，我再也不想。”^④

不过法国国王和大臣们并没有放弃在华法国传教团。1779 年 1 月 24 日，萨尔提尼部长给晁俊秀写了一封秘信，这封信措辞严厉，反复强调法国国王对该传教团财产的所有权，并命令其严加保护：

国王不只是传教团事业的保护人，而且是传教区的创立人，其财产的唯一主人，他可以通过管理者的节俭，信徒的虔诚，抑或其他方式来增加财产。到目前为止，您还是财产管理人。耶稣会被取缔后，国王像对待在俗教士一样，任命您为管理者。您要记得，忠诚的管理人的首要职责是保证托管物完好无损，而最重要的是除了主人，不能向任何人汇报财产情况，除非获得许可。

目前，国王并未赋予您自由行事的权力，关于传教团财产的所有权，他禁止您和法国传教团的其他人承认除他之外的任何权力人。您要让所有的法国传教士周知国王的意愿，即使

①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3), p. 307.

② 在葡萄牙、法国、西班牙等国分别取缔耶稣会后，葡萄牙在澳门于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亦即逮捕耶稣会士，并于十一月五日将他们押遣回国。参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年，第 163 页。

③ Catherine Marin.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près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Transversalités*, n°107, juillet-août 2008, p. 21.

④ Catherine Marin.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près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Transversalités*, no 107, juillet - août 2008, p. 22.

这与罗马和里斯本发来的命令相悖。如果葡萄牙人，传信部教士或其他人仍试图与国王作对，那么国王允许您将此信的复印件给他们作为答复，您要记得上报。^①

1780年8月2日，意大利奥古斯丁会教士安德义（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被加冕为北京主教，这是按照罗马的授意由葡萄牙国王指定的。受任仪式后，安德义立刻宣布北堂资产属其管理，面对这一紧张局势，法国国王重新考虑并采纳了钱德明多年前提出的在鞑靼地区建立教区的建议。在交给法国驻罗马大使贝尔尼（Bernis），由他转交传信部负责人安东尼利（Antonelli）的陈情书中，法国提出了这个计划，即请求罗马教廷建立一个新的奉天主教区，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长城以北地区，而且包括北京城，至少包括北京皇宫，并把它委托给法国前耶稣会士钱德明神父，法国传教团将归其管辖，从而避免和葡萄牙主教之间的各种矛盾。^②“这一想法实际上可被看作是法国重建耶稣会传教团的第一次尝试，它不仅可以给传教团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而且使传教团有可能建立一个初修院，假以时日便会培养出一批耶稣会核心会士。”^③

面对法国的请求，罗马回复说，如果贝尔尼主教向传信部提出的要求只是批准钱德明成为一位普通的传信部教士，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但如果要赋予其宗座监牧的各种权力，这有可能破坏原来的良好秩序，从而引起混乱：

首先，北京主教看到一位拥有教廷权威的宗座监牧要取代他，那么他会认为这是教廷代表在他教区对其权力的侵犯，并去寻求委派他的人的保护和支援，以捍卫他的事业。

第二，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还是不可避免地就哪些人应当服从新的宗座监牧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如果我们想让北京所有的前耶稣会士服从，那很快就会形成一个由被取缔的耶稣会的成员组成的团体，它将不受主教管辖，这违背克莱芒十四世教皇的谕令。该谕令1773年8月24日规定，前耶稣会的教士有担任教廷职位的资格，但必须完全服从主教或宗座代牧……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另一个情况，在北京，除了前法国耶稣会士，还有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当然不想服从新的法国宗座监牧……因此，除了保持原有的合法宗教秩序，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中国所有的传教士都全权服从主教或宗座代牧的管辖。

因此，为了满足由前耶稣会士组成的北京传教团的需求，最好的计划就是法国国王1776年提出的建议，教皇也同意，即让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取代他们。^④

罗马婉拒了法国的请求，并列举了此方案将会遭遇的种种困难。但此封回函使法国把视线重新转回到钱德明神父提出的建议——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接管北京法国传教团。

五、法国传教团由遣使会接管

其实早在177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便被询问过是否愿意接管北京法国传教团，但是它以没有能胜任北京耶稣会士职位的科学教士为由拒绝了。此时，有人提议让奥拉托利会来接管，然而海军部长萨尔提尼呈给国王的报告中又将该修会排除在外，原因是：奥拉托利会在冉森主义时期曾与耶稣会之间出现教义分歧，这将不利于他们和谐共处。然而，处理好传教团的命运变得迫在

①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3), pp. 334 – 336.

②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Suit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4/5), pp. 573 – 577.

③ Catherine Marin.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près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Transversalités*, n°107, juillet – août 2008, pp. 22 – 23.

④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Suit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4/5), pp. 577 – 579.

眉睫，北京神父传来消息说葡萄牙人霸占传教团财产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除了葡萄牙人，教廷传信部的意大利神父也试图将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揽入教皇的怀中。^① 嘉类思神父十分担忧传教团不稳定的局势，于是 1782 年再一次向外方传教会提出请求，却又一次遭到拒绝。

但萨尔提尼并不看好外方传教会，他在给贝尔坦的信中举荐法国遣使会。他这样讲道：

先生，我最初也认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代替耶稣会士，对北京法国传教团是非常有益的。但重审一下此事，我觉得，这样可能收获不了国家期待的科学方面的成果。外方传教会会士为数不多，很难找到精通文学方面的学者，而且没有一个在俗教徒，所以找寻必需的艺术家人也很困难。遣使会则人员众多，没有这些不便，我毫不怀疑它可以实现我们所有的期待。

在我看来，新老传教士能和谐团结，充满令人欣喜的融洽气氛是最重要的。我坚信，从这点出发，遣使会再适合不过。若钱德明神父作为外方传教会传教团团长，则不会取得同样的效果。我同意您的观点，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和谨慎的问题。但请您注意这样的安排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会遇到各种无法克服的困难。传信部会以取缔耶稣会的敕令为由反对我们建议的团长，而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也不会同意。外方传教会教士过去和现在都拒绝让前耶稣会士担任巴黎传教团的财产管理者，尽管只有他们才能胜任。所以就有更多的理由反对让一个前耶稣会士担任北京传教团的团长了。相反，如果是由遣使会会士来取代，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提醒他们要敬重钱德明神父，而您也会叮嘱钱德明神父全力照顾这些新教士，因为只有这样，传教团才能从混乱中恢复和谐团结。^②

虽然萨尔提尼看好遣使会，但其总会长雅基耶（Jaquier）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三次拒绝了接管北京法国传教团的提议，他给出的主要理由是缺乏传教士。时任法国海军部长的卡斯特里侯爵（Castries）接替了萨尔提尼负责北京法国传教团事宜。他于 1782 年 11 月 7 日在凡尔赛给雅基耶写了一封语气强硬的信：

先生，我已经让德·维弗尔（de Vaivre）负责说服您接管前耶稣会士管理的中国传教团。但我痛苦地发现您在给他的回信中因害怕无法胜任新的任务而拒绝了这个提议。尽管您的谨慎值得称赞，但我仍然相信将传教团交到你们手里是最好的选择。目前，只需要您提供一两位神父和一位外科医生。国王的意思是，您先这样做，然后等时机成熟了，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维护和促进这个传教团的发展。此传教团与众不同，它与基督教和政治都有关系。我毫不怀疑，您将乐意支持政府的看法，用对您的传教会相同的热情来支持有利于宗教和国家的事业。因此，我请您和德·维弗尔先生考虑把中国传教团与您的教会合并起来的适宜举措，并尽快采取行动，利用有利的季风季节，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和运送必需品。^③

当遣使会收到这封信时，雅基耶的秘书提醒他，这个以国王的名义不断提出的建议实为命令，他不能再推辞，否则就将被视作不服从，最终雅基耶被迫同意了。1782 年 11 月 22 日，嘉类思神父告知贝尔坦遣使会接受了这个提议的消息：

您可能已经知晓，我们的中国传教团刚交由遣使会负责了，此前他们曾提出面临的很多困难。此外，外方传教会本应该也遵从国王的意愿，但因传教士不足，未能担负此项任务。遣使会教士热情满满地投入了这项事业，他们已经安排两名神父和一位外科医生，如果可能

① Catherine Marin.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près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Transversalités, no 107, juillet – août 2008, pp. 23 – 24.
②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Suit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4/5), p. 593.
③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Suit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4/5), pp. 596 – 597.

的话将在下半年季风期出发。其中一位神父是数学家，品行端正，精明强干，而且只有 32 岁，很虔诚。如果罗马尚未及时任命主教或宗座代牧的话，他将被任命为团长，明年将上任。我给这些神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包括传教团财产，北京住院教士和现状以及外省的情况。^①

雅基耶挑选的三位赴华法国遣使会士是罗广祥（Nicolas Raux）、吉德明（Jean-Joseph Ghislain）和巴茂正（Charles Paris）。罗广祥是位天文学、地理学和植物学家，被任命为法国传教团团长；吉德明是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巴茂正是位机械师和钟表匠。三位传教士于 1784 年 3 月 20 日从布雷斯特港出发，乘坐印度公司的商船，于 8 月 23 日抵达澳门，29 日到达广东。罗广祥向北京的前耶稣会士们通知了他们的到来，神父们非常高兴，立刻给罗神父回信：

您通知我们您到了广东，这让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真诚地感谢上帝作出如此恰当的安
排，尽管您和遣使会对负责中国传教团一事并不是非常情愿。中国传教团以前是你们的友
耶稣会士管理的，但没有什么比这个选择对我们更好的了。

我们都知道，在耶稣会还存在的时候，圣文生（Saint Vincent de Paul）创立的遣使会和
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还知道，耶稣会被取缔后，你们为前耶稣会士提
供的各种服务，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的传教士被遣返途经你们所在地时。先生，我们相信，
您和您的同伴也会一样真诚地对待我们。我们请您相信，我们所有的同事和朋友乐意向您传
授他们的经验，他们在中国待得时间长，了解这里的风俗习惯，而且会尽他们所能为您提供
各种服务。^②

遣使会三位神父于 1785 年 4 月到达北京，前耶稣会士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晁俊秀写给贝
尔坦的信中曾讲述过他们之间的和睦相处：

遣使会士 4 月底到达北京。5 月初，我将法国传教团交给他们管理。他们被当作和平天
使般看待。我给他们提供了所有的信息和帮助，以方便他们管理，尤其是刚开始，一切都很
困难。

阁下，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派来这些值得尊重的接任者。他们正直，充满激情，虔诚而有
才华。他们的行事作风与我们完全一致。我们十分亲密地在一起生活，有人说他们变成了前
耶稣会士，而我们变成了遣使会士。尤其是罗广祥，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能把每个人的
能力发挥到极致。他积极，勤劳，睿智，虔诚而且有魅力。^③

罗广祥在致贝尔坦的多封信中，也谈及了他们和前耶稣会士之间的融洽关系，如：“我的会
友和我，我们和这些前耶稣会士相处得非常融洽。和平和团结的气氛萦绕在所有传教士们当中，
我们也都尽己所能以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牢固。”^④“在我 1785 年 11 月的信中，我很荣幸
地向您忠实地讲述了我们所受到的亲切和真诚的接待，而时间只会让我们和这些令人尊敬的前辈

①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Suit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17, 1916 (4/5), pp. 597 – 598.

② Henri Cordier. 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Secrétaire d' état au XVIIIe siècl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14, 1913 (2), pp. 235 – 236.

③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Suit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17, 1916 (4/5), p. 605.

④ Henri Cordier. 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Secrétaire d' état au XVIIIe siècl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14, 1913 (2), pp. 238.

们变得更友好，更团结。”^① “友好、团结、和平的氛围继续萦绕在这所住院的新老传教士们之间”^② 等等。

六、遣使会管理下的法国传教团

罗广祥不仅领导有方，而且因精通天文历算，很快便得到乾隆皇帝赏识，初任钦天监监副，后又任钦天监监正。他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开始的全国大教案中，依仗皇帝对他的恩宠挽救了不少教士的命运。这场教案来势之猛，发展之快，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被关押的有 13 名传教士，3 名欧洲主教，14 名中国教士和 30 名中国教徒。最后被收监的 16 名欧洲人中 4 人死在狱中。”^③罗广祥在教案发生之时一直为营救传教士而奔走，乾隆从塞外还朝之际，他又率同道出迎。乾隆很高兴，教案终于有了转机。樊国梁在《燕京开教略》中记载：

降生后一千七百八十五年，皇上由塞外还朝，仆等出迎，上甚喜，似有垂念传教各士之意，仆心稍慰。是年洋历十一月初十日，皇上果颁上谕一道，飭将未死之传教士十二名，俱由刑部赦出。^④

乾隆发布的这道上谕，在《清高宗实录》中记载如下：

此等人犯，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别项不法情事，如呈明地方官，料理进京者，原属无罪。因该犯等，并不报明地方官，私在各处潜藏，转相传引，如鬼域伎俩，必致煽惑滋事，自不得不严加惩治，虽坐以应得之罪，朕仍悯其无知，仅予圈禁。今念该犯等究系外夷，未谙国法。若令其永禁囹圄，情殊可悯。所有吧哱哩映等十二犯，俱着加恩释放。如有愿留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着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以示矜恤远人，法外施恩至意。^⑤

此份上谕颁布后，晁俊秀于 1785 年 11 月 20 日写给贝尔坦的信中谈及了罗广祥在教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北京来了一位会长，他睿智，谨慎，充满激情地面对我们所处的困境。他短时间内就将一切回归秩序。他让我们忘记过去。我们仅仅期待一件事，即看到我们的宗教遭遇的最恐怖的暴风雨结束。他给了我们安慰。他感动了皇帝，只消一刻，皇帝就改变了主意，这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尽管教士们之前被判终生监禁，但皇帝命令将他们交给刑部，他们有权选择留在北京的教堂或返回欧洲。^⑥

教案发生之后，罗广祥等教士的使命更显艰巨，他在 1788 年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他在京的繁忙工作：

每天我要讲四种语言，法语、拉丁语、中文和鞑靼语……我要讲授教理，布道，忏悔，还要管理圣事；时不时地我还要去大人們的家里回答有关欧洲、海洋、天体科学等数不清的

① Henri Cordier. 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Secrétaire d’ état au XVIIIe siècl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4, 1913 (2), pp. 241.

② Henri Cordier. 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Secrétaire d’ état au XVIIIe siècl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4, 1913 (2), pp. 257.

③ 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6 页。

④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北京：救世堂，1905 年，第 399—400 页。

⑤ 《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年十月甲申上谕，卷 1240。

⑥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Suit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4/5), pp. 612 – 613.

问题……先受苦再升天是应当的，因为我想带着尽可能多的中国灵魂随我去天堂。^①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再也无暇顾及这个遥远的传教区。1790 年 1 月 29 日，贝尔坦给晁俊秀的信中讲道：

我很高兴，您、钱德明和罗广祥和平相处，我祝愿您们能继续这样。我就不告诉您法国的灾难了。这是法国内部的灾难，它像罗马帝国一样坍塌了，因为自己的负重，错误和腐败。^②

尽管如此，从 1790 至 1800 年，还是有韩纳庆（Robert Hanna）、刘方济（Jean François Régis Clet）、南弥德（Louis François Lamiot）、李士奈（Jean F. Richenet）等八位^③法国遣使会士到达中国。由于在中国推行日趋严厉的禁教政策，“终于到 1800 年，外国传教士不再入华，中国基督徒社区逐渐归入本土神父照管，直到 1840 年以后才逐渐局势明朗。”^④北京传教团的几位前耶稣会士在此期间也相继离世，随之，耶稣会士在华第一时期的活动彻底画上了句号。

七、法国救援传教团的动因

虽然从康熙后期开始的“百年禁教”使天主教在华发展受到重创，但法国耶稣会士们凭借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卓越超群的才智，不仅认真履行了其传教士的职责，而且完成了皇家科学院赋予他们的科学使命。耶稣会被取缔后，法国的国王和大臣们不肯轻易放弃这个融政治、宗教、科学于一体的在华传教团，在京的前耶稣会士们共同努力，展开了一场持续长达十年、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

然而遣使会接管法国传教团之时，也正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把几乎整个欧洲都卷入其中之时。面对流向远东的资金和人员都很难得到保证的局面，有不少法国人呼吁政府能继续给予传教团资助，小德经（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北京、马尼拉、毛里西亚岛游记》一书中指出了该传教团对法国的重大意义，也为当年法国那次远程大救援的动机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至于北京法国传教团，事实已经证明它有多么重要，只有眼盲者才看不出它对我们能在北京拥有一席之地所起的作用。为了能拥有这样一个团体为己服务，我们的竞争国会不惜重金来购买，会愿用它所拥有的一切进行交换。只要中国一直对欧洲封闭，那么在北京还留有人员的国家就是非常幸运的。通过这些人，这个国家可以了解中国的情况，可以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我据实而言，但细节却不能透露。我重申一遍，法国政府救援传教士、保护这些值得尊敬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明智之举。四万法郎对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这笔微博的资金对北京法国传教团的为继就足够了。放弃传教团是一大不幸，也许现在的情形不足以说明它有多么重要，但当一旦失去它，人们便会感到损失巨大。如果能够振兴传教团，这是件多么令人幸福的事情呀，而且维护它也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⑤

1814 年，教皇庇护七世（Pie VII）重建耶稣会。1842 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他们之后的

① Catherine Marin.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près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Transversalités*, no 107, juillet-août 2008, p. 27.

②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Suit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17, 1916 (4/5), p. 621.

③ 另四位中文名不详，他们是 Raymon Aubin、Louis Pesné、Pierre Minguet、Lazare Dumazel。

④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14 页。

⑤ 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Voyage à Peking, Manille et l' Ile de France II*. Paris : L'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pp. 341 – 342.

活动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天津等地，而北京地区一直由遣使会负责。

主要参考文献

[1] 埃德蒙·帕里斯著,张茹萍译:《耶稣会士秘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2]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著,谷裕译:《耶稣会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80—81页,第85页。

[3]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399—400页。

[4] 孟德卫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67页。

[5] 《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年十月甲申上谕,卷1240。

[6] 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57页。

[7] 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8]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63页。

[9]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10]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第235页。

[11] Cordier, Henri.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17, 1916 (3), pp. 273—274, pp. 287—297, pp. 305—307, p. 308, pp. 334—336.

[12] Cordier, Henri.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eking (Suit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17, 1916 (4/5), pp. 573—579, p. 593, pp. 596—598, p. 605, pp. 612—613, p. 621.

[13] Cordier, Henri. 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Secrétaire d' état au XVIIIe siècl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14, 1913 (2), pp. 235—236, p. 238, p. 241, p. 257.

[14] De Guignes, Chrétien-Louis-Joseph. Voyage à Peking, Manille et l' Ile de France II. Paris : L'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pp. 341—342.

[15] Marin, Catherine.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près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Transversalités, no 107, juillet-août 2008, p. 12, pp. 18—19, p. 20, p. 21, pp. 22—24, p. 27.

**The French Mission in Peking afte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 Study Based on the Correspondences of the Missionaries**

LÜ 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Society of Jesus developed into an enormou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order. Unfortunately in 1773, over 200 years since its foundation, it was suppressed by Pope Clément XIV by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papal brief-Dominus ac Redemptor after encountering much criticism for its submission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Roman Curia and the missionary work it carried out overseas. The incident prompted the Portuguese and the Roman Congregations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who had long-standing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China to grab the property used to belong to the French mission in Peking. To protect them from being snatched by other countries, the former members of the Jesuit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rench Emperor and some ministers started a hard-won battle over the ownership of these properties that took over a decade and engaged stakeholders across two continents. Thanks to their consistent efforts, the Roman Congregations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eventually approved in 1783 that the French mission in Peking should be taken over by the French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Lazarists). In 1814, the Society of Jesus was reinstated by Pie VII and in 1842 members of the Society was dispatched back to China and the Mission of Peking has remain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rench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ever since.